

中文版
Chinese Edition

日英战后和解 (1994-1998 年)

沼田贞昭

(原日本驻加拿大、驻巴基斯坦大使、驻英国特命全权公使)

SGRA | 28 | REPORT



今天，我将以一个外交工作者而不是学者的身份就战后和解问题谈一谈自己的经历。战后和解问题涉及很多方面，我对这个问题接触最多的是在1994—1998年担任日本驻英使馆公使的时候，因此想就当时情况做一下回顾。

那是我第二次赴英国工作。我1966年进入外务省，在牛津大学做了两年研修生，取得学位后在位于伦敦的日本大使馆工作了两年，到1970年为止。24年后，我又回到了英国。上世纪60年代后半叶我刚赴任时，战时的记忆还没有消退，但战俘问题也没有引起多大的关注。而1995年我第二次赴任正值战争结束50周年，这一问题已经很严重，我也在问题的处理上费尽了心思。

战后问题处理的三个层面

战后问题处理涉及三个层面。第一是法律处理问题，第二是道歉问题，第三是和解问题。第一个法律处理问题，指的是缔结和平条约，处置战争罪行以及给予赔偿。第二个道歉问题，就是诸如政府元首如何表态，以及对受害国国民，尤其是遭受战争危害的人们、俘虏以及慰安妇等人采取什么方式进行道歉的问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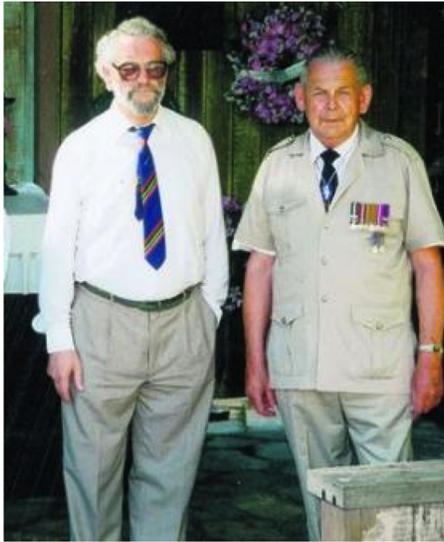
而第三个，就是今天主要论及的和解问题。这既是政府之间的和解，也是曾参与战争的官兵、军队、军人之间的和解，又是普通民众与旧军人——有时也包括战俘在内——的和解。此外，还有像日本政府对英军前战俘、日本政府对韩国前慰安妇的和解等各个层面上的问题。

至于法律处理问题，就英国而言或者与同盟国的关系而言，旧金山和约的签署宣告了和平。关于战争罪，和约第11条承诺接受所谓东京审判（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及同盟国战争罪刑法庭的审判。在东京审判中，25名甲级战犯被判有罪，其中7人被判处死刑。在亚洲等多个地区进行的乙丙级战犯审判中，约5700人受审，被判死刑人数为934人。日本接受了所有判决结果。

关于赔偿问题，法律上的立场是在旧金山和约规定下，日本放弃“对同盟国国民及日本国国民的对象国及其国民的请求权”，但实际上存在很多问题。

和约第16条中规定了“对位于中立国及日本盟国的日本境外资产及其等价物的赔偿”，英国在1952年将这一赔偿与接收的日本境外资产300万5千英镑及对泰缅铁路建设中强制劳动的赔偿金17万5千英镑三者总额按照前战俘每人76.5英镑、民间被扣押者每人48.5英镑标准发放。然而，前战俘认为这一数额远远不够，淤积了强烈的不满情绪。

1994年，就在我到任伦敦后不久，由日军前战俘组成的团体——JLCSA（Japanese Labour Camp Survivors Association，日军强制收容所生存者协会）会长阿瑟·蒂瑟林顿（Arthur Titherington）与曾遭受沦为其他国家战俘等



左为阿瑟·蒂瑟林顿先生

境遇的6位民间人士一起向东京地方法院提起了每人1万3千英镑的赔偿诉讼。1998年11月，东京地方法院以“国际法未规定个人损害赔偿请求权”为由判决原告败诉，东京高级法院、最高法院也分别于2000年3月及2004年3月做出了相同判决。

英国政府在法律层面所采取的立场与日本政府相同，但二战结束50周年纪念日前后发生了很多事情，其后国内也掀起了诸多争论，以英国退役军人会（Royal British Legion）为主要力量，英国政府展开了宣传，主张应该对战俘采取一定措施，这些我接下来还会谈到。响应这一宣传，英国政府在2000年11月向前战俘，或其遗属及其配偶发放了每人1万英镑的特别安抚金，英国国内的问题由此得到处理。

接下来是道歉问题。尤其是在日本，自20世纪90年代开始，道歉成为日本与亚洲各国关系中的突出问题。历任首相曾就此多次表态，我认为我们可以将在1995年8月15日二战结束50周年纪念日这天时任首相村山发表的谈话作为道歉问题的一个大致结点。

最后是和解问题。曾在英国和我一起致力于战后和解问题的山梨学院大学小菅信子教授在其由中央公论新社出版的新作《战后和解》一书中，将和解定义为“交好或恢复和平后仍横亘在原敌对国家之间的感情摩擦与对立的解决”。这主要是一个情感问题。正因为是情感问题，才最难以解决。

和解问题也是我在伦敦实际接触过的。这个问题难就难在与曾沦为日军战俘者的关系处理上。即便我以大使馆工作人员的身份提出和解愿望，以前的战俘也不接受。由于大使馆是日本政府机构，曾遭受日军迫害的人就会认为大使馆的人和以前的日军是一丘之貉。因为存在这种抗拒心里，政府与曾经的战俘之间就很难实现直接和解。

因此，政府之外因素的参与就变得很重要。其行为就是催化剂，推动了和解进程。

还有一点，就是这种问题一旦发生，就会给对象国的公众舆论造成极大影响，因此如何应对这种影响。从这个意义上说，媒体对策是至关重要的。

赴任英国以前

我谈谈自身的经历。在赴英国工作以前，1991—1994年这段时间，我担任外务省的副发言人。当时我就开始接触道歉问题。1991年3月我从澳大利亚回国就任外务省副发言人，当年5月陪同时任首相海部俊树出访东南亚各国。当时我的任务是在首相出访时面向当地媒体或第三国媒体进行新闻发言。

海部首相在新加坡作了演讲，其中关于历史问题有下面的阐述：“对于我国给亚太地区众多人民带来难以忍受的痛苦与悲伤的行为表示深刻反省”。“反省”这个词很难翻译。英语有 reflection 这个词，也有很多其他说法。有人就英语译文征询我的意见，我就选择了 sincere contrition 这个说法。外务省的一个前辈问我为什么要选那么生僻的词，我当时注意到，BBC等第三国媒体的工作人员就此次新加坡演讲内容发简讯时就用到 contrition 这个词。这个词在某种程度上带有忏悔的感情色彩。

我接触媒体遇到的下一个问题是慰安妇。1992年1月时任首相宫泽喜一出访韩国，我担任陪同。当时，慰安妇问题已经成为日韩两国间的一个大问题。宫泽首相对时任韩国总统的卢武铉表达了“衷心的反省与歉意”。同年7月，时任官方长官加藤纮一发表谈话，在日本政府以宫泽首相访韩为契机所进行调查的中期报告里提到这一问题可能有政府参与，以及要表明道歉与反省之意。

此后，该调查持续了大约一年，1993年8月，时任官房长官河野洋平发表谈话，提到慰安妇问题有原军队参与，以及要就严重伤害女性名誉与尊严的行为表明道歉与反省之意。加藤官房长官和河野官房长官这两次发表谈话，我都负责用英语向在东京的外国媒体就其内容作简报。压力非常大。两次谈话都持续了90分钟左右，提问极其尖锐。这可以说是我接触慰安妇问题的开始。

1993年8月，自民党一党专政体制瓦解，代表日本新党的时任首相细川护熙在就职演说中提出“再次就历史上我国给众多民众带来难以忍受的痛苦与悲伤的侵略行为与殖民统治表示深刻反省与歉意”。到目前为止的历任首相对这一问题的表态中，要数这一次最为深刻。

各位听到这里或许会有疑问：为什么距战争结束过去了近50年，到了20世纪90年代才出现这种表态呢？换句话说，我们确实正视了历史，反复尝试使用各种方式予以表达，可为什么要花那么长时间呢？这种疑问我本人也有。

对于这一点的看法存在分歧，我个人的观点是，1945年战争结束后，日

本就处于盟军的占领之下。我觉得，太平洋战争的目的是什么，太平洋战争中牺牲的人们是为什么而献出了生命，这些问题在被盟军占领时期，日本国内未必进行了充分讨论。而还没等讨论进行，冷战又开始了。

东西方冷战一爆发，冷战结构就会反映到国内。我记得剧作家山崎正和很久以前提过一个说法叫“日本国内的柏林墙”，在这种状况下，对历史的清算问题就成为了国内左右对立的焦点。一旦成为左右对立的焦点，大家就无法客观地讨论，达不成共识，就这样进入了20世纪90年代。

回顾这一时期，问题的核心就是中国、韩国、包括东南亚在内的亚洲地区。人们只想着亚洲问题，而没有意识到这一问题与美国、英国以及民间被扣押者众多的荷兰之间的关系。

英国战俘问题与对日战争胜利50周年纪念

我到伦敦大使馆担任公使是在1994年3月，直到1998年1月，做了4年左右。期间我开始参与解决和解问题，在详细介绍这段经历之前，我先对英国战俘问题做一些说明。

这张照片上的菲利普·马林斯（Philip Malins）先生，二战时期在缅甸战场做军官，战后致力于与日本和解，其功绩受到认可，被授予旭日双光章。这位友人今年（2012年）4月逝世，享年92岁。他生前将授勋仪式的致辞原稿发给了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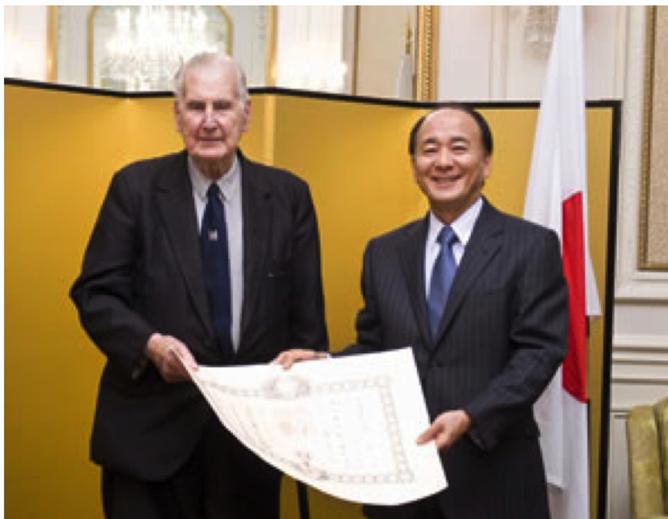
在致辞中，马林斯先生说了下面的话。在缅甸战场上，日军阵亡比例达60%。这是因为恪守“切勿受生擒为俘之辱”的战阵训而丧生的人很多。盟军阵亡比例为7%。此外，沦为日军战俘的英军官兵为5万人左右，在盟军各国中人数最多，死亡率为25%。沦为德军战俘的英军官兵死亡率为5%。

其次，关于原子弹问题，盟军官兵认为原子弹为战争画上了句号，挽救了日本与同盟国双方的众多生命，但多数日本人则认为原子弹袭击是对人类的罪行。因为这种分歧，与德国相比，日英的战后和解就更加困难。

最后，马林斯先生表示，一战后没能达成和解，21年后爆发了二战，只有和解是交战双方的最终胜利。

自1995年年初开始，由于与英国的关系，战后和解问题作为一大难题浮上台面。1995年8月15日，在英国看来，是对日战争胜利50周年纪念日。

当时英国人对日本的印象如何呢？刚刚我提到我1966—1970年在英国，过了24年之后又到了英国，和20世纪60年代相比，英国对日本的关注可以说是大大提高了。我1970年离开英国时，在伦敦的日本人只有2800人。在伦敦的日本餐厅刚刚开了第二家。而到了1994年我再去赴任，日本餐厅的数量



左为授勋仪式上的菲利普·马林思先生

已经多达一百五六十家,吃都吃不过来。居住在伦敦的日本人也超过了两万人。居住在全英国的日本人超过了五万人。

之所以日本人数量激增,是因为20世纪80年代时任英国首相玛格丽特·撒切尔(Margaret Thatcher)注重搞活英国经济,吸引日产等众多日企到英国投资。因此,英国对日本的经济与产业产生了相当正面的印象。

另一方面,随着对英国战俘的残忍行为见诸报端,英国对日本也有着负面印象。1995年,战争结束50周年一到,自年初开始,讲述残酷经历的战俘回忆录在我的印象里基本天天出现在英国媒体上。我想这一事件是有着如下背景的。

1945年5月,盟军在欧洲战场取得胜利。凯旋的英军士兵受到了英雄般的礼遇,当时,缅甸战场上还有英军作战,并且战势不乐观,接连吃败仗。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战争结束,缅甸战场上的这些官兵终于得以回国。这些人被称为Forgotten Army,被遗忘的军队。他们遭到了英国人民的冷眼相待,仿佛是在质问他们“为什么在这个时候才回来”。整整50年,这些人一直活在这种怨恨之中。50年过去了,才有了倾听这些人的怨恨与辛酸的呼吁。

基于这种情况,当时的英国政府、代表保守党的约翰·梅杰(John Major)首相采取了这样的方式来庆祝战后50周年纪念日。5月18日,与欧洲有关的VE Day(Victory in Europe Day,欧洲胜利日),英国邀请了敌国德国、意大利的元首,举行国际性庆典。而8月15日VJ Day(Victory over Japan Day,对日胜利日),则未邀请日本要人,只在英国国内及以英联邦为主开展了内部纪念活动。

谢菲尔德大学的雨果·道伯森(Hugo Dobson)教授与小菅信子教授合著的《战争与和解的日英关系史》(法政大学出版社)一书中,对这段时期英国媒体对VE Day与VJ Day的处理作了分析。回顾当时英国的报道,关于VE Day

的报道包含四个要素，即回顾、和解、乡愁与祝贺。而关于 VJ Day 的报道中全然不见这些要素。该书分析称，这就如同原封不动地将历史拖到今天，现在与过去之间看不到界线。

日本战后 50 周年与村山谈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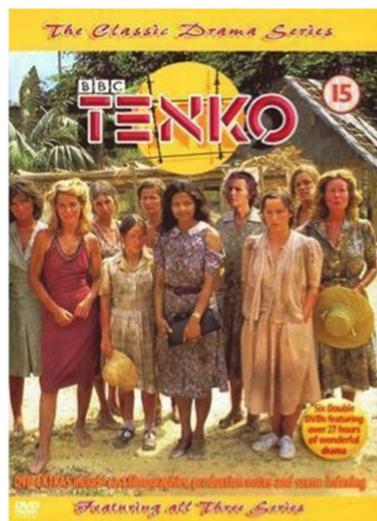
其间，日本国内也迎来了战后 50 周年，对外表明什么样的态度成为了议论的焦点。6 月，众议院作出决议称“要认识我国历史上所作出的行为及对其他国家人民、尤其是亚洲各国人民造成的痛苦，表示深刻反省”。然而，英国媒体认为“深刻反省”算不上道歉。况且众议院 509 名议员中赞成这一决议的只有 230 人，英国媒体报道称在认识历史的深刻程度上日本国内意见仍不统一。

另一方面，到了 8 月，广岛、长崎原子弹袭击纪念日临近，英国国内论调分成了两派。一派是肯定派，认为原子弹袭击对结束战争是有必要的，另一派则认为当时日本行将投降，使用原子弹袭击实属过当。BBC 电视连续剧《点名 (Tenko)》是当时紧张气氛的一个体现。点名指的是每天早晨的点名活动。这部电视剧于 20 世纪 80 年代上映，以新加坡沦陷后，被扣押在日军收容所的英国人、澳大利亚人及荷兰女性的悲惨遭遇为题材。该剧在这一时期重播。

其间，我们日本驻英国大使馆向东京进言：“1995 年 8 月 15 日是一个重要日子，首相要表明态度。”我想亚洲其他国家的大使馆也提出了相同的意见。

此后就到了 8 月 15 日的村山谈话，此前的 8 月 12 日，村山首相向梅杰首相发去了连任贺信，祝贺梅杰首相于 7 月连任英国保守党党首，信中提及了战俘问题，写到将表达深刻反省与诚挚歉意。这件事得到了日本报纸报道。英国国内也报道了一件事，当时首相在某个地方度暑假，休息的时候突然被一个日本记者问道：“您给梅杰首相寄了封道歉信吗？”首相回答：“不，那不是道歉信。”这件事在英国被大肆报道，我急忙出面平息骚动。我记得 13 日、14 日这两天，我在 BBC、电台、电视台共出镜 3 次，解释说那封信明确表达了首相的歉意。

下面就谈 8 月 15 日的村山谈话。村山谈话的关键点是“殖民统治与侵略 (its colonial rule and aggression)”“众多国家、尤其是亚洲各国人民造成了极大伤害与痛苦 (tremendous damage and suffering to the people of many countries, particularly to those of Asian nations)”“对此表示



BBC 电视连续剧《点名 (Tenko)》

深刻反省与诚挚歉意 (express my feelings of deep remorse and state my heartfelt apology)”。

1995年初，曾沦为战俘的人有了越来越多的机会以各种形式在广播中、电视上诉说他们的悲惨经历。我当时在伦敦，4年里接受了126次BBC采访，唯独这一段时间没有接受采访。因为如果接受采访，很可能会碰到与曾沦为战俘的人针锋相对的场面。我认为这是很不利的，所以不该接受采访，而应当等到8月15日首相表明态度后全力进行宣传工作。8月15日的首相谈话安排在日本时间8月15日早上，正是伦敦时间的8月14日深夜。

BBC Radio4频道有一档上午7点播出的时事节目叫Today，拥有以英国国会议员为首的众多听众。第二天一早，这档节目请到了藤井宏昭大使，藤井大使表示这是基于内阁决定的日本政府正式道歉。其实，在村山谈话发表后的记者招待会上，村山首相就表示这次道歉以英国战俘为对象。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我刚刚提到，尽管在致梅杰首相的信中已有明确表达，但后来出了一点状况，这次表示也含有澄清这一点的意思。当天，藤井大使共在三档节目露面，分别是早上的这档节目、下午一点的黄金时间新闻、晚上十点半的BBC节目，我在其他频道也露了三四回面，做了相应说明。

8月15日当天，伦敦举行了VJ Day庆典，原缅甸战场的军人在伊丽莎白女王的注视下列队走过白金汉宫。通过这种方式，他们的怨恨与辛酸得到了回应。庆典一结束，第二天起，英国的媒体就变得鸦雀无声。在大使馆里我们谈到该怎么解释这件事，我感觉这是一种宣泄。正如我刚才谈到的，他们被称为Forgotten Army，他们为回国后没有获得多少理解而感到怨恨和辛酸，现在这种怨恨和辛酸得到了倾诉，这种宣泄也就告一段落了。我认为事情的结果就是，在这一阶段，战俘等问题在英国国民感情层面大致划了个句号。

民间交流

之前谈的都是法律处理和道歉问题，接下来我就要涉及和解这个难题了。从1995年夏天开始，我们伦敦大使馆的人员一直挂念的就是天皇可能很快要出访英国。昭和天皇曾在1971年访问过英国，而现任天皇这一次要来，我们就必须考虑如何处理好与战俘问题有关的英国国内环境，做好准备工作。

政府人员即使向曾作为战俘遭受痛苦的人提出和解，也得不到接受。我们要考虑的，就是在这样的状况之下，我们能做些什么。

首先，这涉及到曾在同一个战场作战的敌我双方官兵的和解。在这个问题上起到重要作用的是平久保正男先生。他参加过英帕尔战役，战争结束后在丸红工作，一直居住在伦敦。正是他在1988年带领了两名曾与他为敌的英国士兵访问日本。

以此为契机，1990年 Burma Campaign Fellowship Group（缅甸战役同志会）在英国成立。会长是退役少将伊恩·利亚尔·格兰特(Ian Lyall Grant)。顺带提一句，现在的英国驻联合国大使就是这位会长的儿子。缅甸战役同志会和日本的全缅甸战役战友团体联络会议开始了互访。1997年2月，日英双方36位有识之士一起在缅甸举行了共同追悼会。将这些曾互为仇敌的人们联系在一起，是对逝者的愧疚，和对永别的战友的思念。



玛丽·格拉斯·布朗宁女士

此后就有了志愿活动形式的民间交流，交流的主体是年轻人与志愿者。大使馆也提出了日英民间和平交流计划，从侧面给予支持，最终促成原战俘与民间被扣押者的家人共784人访日。日本也派出这些活动有关人员178人访英，日英共同追悼访问共举行了4次。

其中有一项活动叫 Pacific Venture，核心人物是一个在萨福克——一个战俘人数很多的地区——教高中生日语的玛丽·格拉斯·布朗宁（Mary Grace Browning）女士。她主动发起了带英国原战俘及民间被扣押者的孙辈到日本去的项目。我们从侧面给予她这个项目以支持，促成了约380位原战俘及民间被扣押者的家人到访日本。

第二个就是惠子·霍姆斯（Keiko Holmes）女士的神之爱（Agape）项目。惠子·霍姆斯女士生长在三重县纪和町（当时叫入鹿），那里有一个纪州矿山战俘收容所，关押英国战俘。其中有16人死亡，市里和矿山公司为他们建了墓，战后一直由当地老人俱乐部的老年人负责清扫守护。惠子·霍姆斯女士与英国人结婚，丈夫去世得早，一直守寡。她听说自己生长的城市有这样的事，就在1989年只身一人来到英国战俘当中，将自己的故乡介绍给他们，此后就开始了带领战俘到访日本的项目，最终促成450人左右访日。

第三个就是小菅信子教授的活动。小菅信子教授是一名历史学家，当时在剑桥大学。她的丈夫在庆应大学做英语语言文学教师，和她一起来到英国，转到剑桥大学国际研究中心工作。1996年11月，我突然在剑桥晚报上看到一篇报道上有张照片，在英国一战追悼日的纪念活动 Remembrance Sunday 上有一个日本女性身着和服，手捧鲜花。我立即和那位女性，也就是小菅教授取得了联系。

顺带提一句，剑桥这个地方出了很多战俘，人们对日本在情感上也很抵触。小菅教授因此发起了一个叫做罌粟与樱花俱乐部的活动，将剑桥曾经沦为战俘的人和日本人联系起来，1997年8月日本驻英国大使藤井宏昭夫妇出席了活动。1997年11月，小菅教授向剑桥的学者同事们发出倡议，举办了从学术



小菅信子教授在英国追悼仪式上献花(《剑桥晚报》报道)

角度分析战俘问题的日英战俘会议，我们大使馆也给予了支持。这一连串的经过在岩波书店出版的一本小菅教授著作《罌粟与樱花》中有记录，书中也多次提到了我。

说到和解仪式，一定要具有一个和解的标志性场所。在英国，这个场所就是威斯敏斯特教堂（Westminster Abbey）。大家都知道，英国前王妃戴安娜的葬礼以及女王加冕典礼等活动都是在威斯敏斯特教堂举行的。借用小菅教授的话说，这里是英国人承载回忆与追悼阵亡将士的大本营。1997年8月，缅甸战役同志会主办的日英共同追悼会就在这里举行，小菅教授向无名战士墓献上了千纸鹤。

作为英国和解的象征，名声位居其次的是考文垂大教堂。考文垂大教堂在1940年遭德军空袭化为废墟，当时大教堂的首席祭司理查德·霍华德（Richard Howard）在BBC广播节目中表示：“战争结束后，我们将致力于原谅与和解而不是复仇。”以此为契机，考文垂大教堂就成为了和解的世界性基地。1995年8月正值战争结束50周年，在大教堂原址建造起了一座和解雕塑。与此同时，维珍航空总裁理查德·布兰森（Richard Branson）向广岛和平纪念公园国际会议中心赠送了一座一模一样的雕塑。

1997年秋季，考文垂大教堂首席祭司约翰·佩蒂（John Petty）和我联系，说美国圣公会的一把手，主席主教埃德蒙多·布朗宁（Edmond Browning）将到访教堂，举行英美日和解仪式，希望我参与，我就出席了仪式并在和解雕塑前致辞。

在这一仪式的推动下，当年的Remembrance Sunday上，时任大使林贞行成为了首位在考文垂大教堂献花的日本大使。在教堂，大使和三名前战俘握手，被英国BBC广播、THE TIMES等多家媒体报道。随后，日英和解纪念仪式就在考文垂大教堂举行了。



在旧考文垂大教堂举行的英美日和解仪式



林贞行大使在考文垂大教堂献花

离任英国

时间在忙碌之中过去，我离任的时间临近了，可我心中还牵挂着一件事。和解的范围，以与参加缅甸战役的前军官们、惠子·霍姆斯女士、玛丽·格拉斯·布朗宁女士等人有接触的前战俘及其亲人们为中心，已经不断扩展开来，但我希望这种和解的范围能够进一步延伸到英国老兵这一整个集体当中。

因此，1997年年底，我就去了皇家英国退役军人会（Royal British Legion），向格拉哈姆·道宁（Graham Downing）会长阐述了和解的进展情况。道宁会长听了以后表示非常关注，也希望参与进来，于是在1998年3月底，会长便携12位会员造访日本。

道宁会长以此为契机开展宣传，呼吁在英国国内政府应针对前战俘及民间被扣押者采取措施，最终促成了英国政府按照每人一万英镑的标准拨款。

1998年1月9日，距我飞离伦敦还有四五天，我将之前有过多番交流的诉讼代表阿瑟·蒂瑟林顿等前战俘及志愿者邀请至大使馆，举行了离任宴会。当我看到大家在各处谈论和解的身影，感到自己近四年的努力没有白费。

与此同时，时任英国首相托尼·布莱尔（Tony Blair）访问日本，在我离开伦敦前几天正忙得不可开交的时候，东京外务省总部打来了电话，说阿拉斯泰尔·坎贝尔（Alastair Campbell）这位从报纸记者做到布莱尔首相新闻发言人建议桥本首相在英国最具代表性的 tabloid（通俗报纸）《The Sun》发一篇文章，想听听我的意见。

我之前就谈到媒体对策至关重要。在英国做媒体对策，最难的就是 tabloid（通俗报纸）。上面的报道极具煽动性。1995年，在报道战后处理问题时，通俗报纸一直是急先锋。同他们的关系很难处理，令我们头痛不已。

我表示求之不得。因为我认为这是向英国民众最直接传达讯息的有效手段。结果1月14日，桥本首相那句“Britain and Japan must go forward together”的声明就登报了。文章的题目是“JAPAN SAYS SORRY TO THE Sun”，这种写法非常具有通俗报纸特色。

当时桥本首相发表的内容，包括表明与村山谈话相同的“反省与歉意”、日英老兵在东南亚举行共同追悼会、将前战俘极其孙辈访日规模由先前的每年40~50人倍增至每年80~100人。对此，《The Sun》写道：这是发自内心的道歉(heartfelt apology)。

我回到东京，成了外务省新闻发言人，不再直接参与这个问题，而天皇于1998年5月访问英国。天皇皇后在伦敦市区巡游时，欢迎群众人数达到两万五千人，其中有大约500名前战俘、前被拘人员及相关人等进行了抗议示威。也有人对天皇皇后毫不理睬。然而，当时英国报纸也刊登了一些批判示威的文章，称这一行为在迎接宾客过程中是不妥当的。我感到同1995年相比，舆论的声音显得平衡了很多。

此时媒体也给予了强烈关注，作为媒体对策，我恳请前日本驻英国大使千叶一夫担任正式新闻发言人。千叶大使及后来就任的驻英国大使馆公使等人以每天几十次的频率接受采访。当时我们明确表示，天皇皇后的到访是对日英前所未有良好关系的巩固；前战俘赔偿问题已通过和平条约得到解决是日英的共同立场；至于道歉问题，政府首脑（指村山谈话）已经做出表态。继而我们发出了将继续认真致力于和解的承诺。



英国《太阳报》(The Sun) 1998年1月14日的新闻报道

结语

谈完了上述经过，那么日英战后和解是不是可以称得上成功了呢？我本人直接参与是在1994~1998年，此后这一进程也在持续推进。问题并没有了结。只是回顾我本人参与的这一段时间，我认为是收到了成效的。

首先，1995年是VJ Day50周年，局面非常困难，我认为我们做到了顺利度过。当时很关键的一点就是在处理问题的过程中和英国政府也保持密切联系。一是在赔偿等法律问题上，我们在和英国政府保持一致立场的同时，就舆论对策进行了充分协商。具体来说，我们将精力集中放在了1995年8月15日时任首相村山的谈话应涉及哪些内容上。这段经历带给我的感受是，在处理此类和解问题时，关键在于在政府层面不要和对象国出现分歧，并且要将精力与关注点放在重要环节。

其次，我们对民间有识之士及志愿者就和解问题发起的提议从侧面给予支持，通过大力宣传使人了解到这种致力于和解的积极努力在不断扩大，从而抵消负面信息的影响。我认为当时在威斯敏斯特大教堂和考文垂大教堂这些标志性场所举行的活动是很有意义的。

仅靠元首是不足以实现和解的。仅靠民众也是不够的。我感觉还是需要各个层面同步推进。

我认为，我到任之初，英国对日情感是正反两面并存的，但随着和解范围的扩大，战俘问题对英国对日情感造成的消极影响逐渐淡化了。

我两次到英国赴任，四年的时间里，我作为使馆工作人员，是将和解问题置于整体良好的日英关系这一背景下来思考的。我思考的不仅是这个问题本身，而是将其放在更为广泛的背景之中，思考解决之道。

今天，我们同中国、同韩国的关系也存在着问题，对于这些问题，日英和解有多大的参考价值，我本人也很难立即做出回答。这些问题更加复杂，如果今天我所讲的内容能在某种意义上提供一点参考，我将十分欣慰。（掌声）

提问



主持人 非常感谢。接下来进入提问环节。

片冈 我想就德国与日本在应对战败上的差别提一个问题。从英国的角度来看，其生活圈，与德国相同，同属欧洲，而日本却属于亚洲。您认为两国应对上的差别是否与这种人种差异有关，还是说差别来源于战败后的具体应对措施？

沼田 是否存在人种差异因素很难说。我不能断言完全不存在。此外，我觉得两国在战后关系处理方式上有所不同。首先，德国与纳粹完全断绝了关系。德国是主动断绝。这是很关键的因素。这个话题比较敏感，不好说得太多，但日本是否在这种意义上与过去真正实现了断绝，我本人也不太想得通，但我感觉通过美军占领时期以及冷战，这种断绝还是实现了的。这个问题很有争议，如果我还是外务省新闻发言人，或许不会谈及这个问题。

其次，欧洲这些国家是经历了无数战争并互有胜负的。几百年、或许还要更长。因此，我的说法比较奇特，那就是他们习惯了打胜仗，也习惯了吃败仗。在这个过程中，他们自然而然地学会了如何处理。我感觉在这一点上欧洲同日本存在差别。

第三，就是战争结束后处理上的差别。刚才我提到，考文垂大教堂正是英德和解的象征。因为在考文垂被德军炸毁的同一时期，德累斯顿也遭到了轰炸。两者相抵，促进了和解。除此之外，两国还在私人交流等很多层面上保持着非常密切的关系。和解是在这种积累之上进行的。

关于与德国的差别，我能想到的就是以上几点。

沈俊傑

今天很荣幸有机会聆听您的演讲，真是收获良多。我提一点感想和一个问题。我直到今天才知道日本和英国这一段漫长的和解历程。给我的感觉是，日本与英国相隔那么遥远，和解历程却长达50多年，那么如今日本面对着同中韩这两个邻国之间的问题，解决问题恐怕更是有待时日。

您的演讲中也多次提到了我的祖国新加坡，现在回想起来，新加坡从未产生很强的反日情绪，村山首相向新加坡战争纪念碑献花一事至今令人记忆犹新，这很不可思议。这是否与日本为新加坡的经济发展给予了大力支持有关呢？

沼田

我刚才提到，我们在新加坡用了 contrition 这个词。关于当时的情况我再多说一些，其实在海部首相发表演讲的前一晚，我设宴邀请了BBC等媒体的特派记者，在进餐时简要说明了演讲内容。当时BBC驻新加坡特派记者就告诉我，大概一周之前他和新加坡时任总理李光耀交谈时，总理提出“日本必须就历史问题表明 contrition”。无巧不成书，这和我英语译文不谋而合。李光耀总理一直都在强烈批判日本对待历史的态度，我们也深知这一点。

此外，日本同新加坡也存在战争赔偿问题，日本已经作了赔偿。我不知道这算不算经济协助，但这大大支持了新加坡的发展。在新加坡问题上人们没有一味关注负面，而是凭借正面因素缓和了局势，我想和这一点是有关系的。

您提到与英国的关系处理都花了这么长时间，那么与邻国的关系问题就更加困难，从某种意义上说是有道理的。我刚刚谈到首先要在确保政府间不存在分歧的情况下携手共同努力，和中韩两国的关系困难就困难在开头这部分。至于为什么困难，人们会有很多看法，我认为从某种意义上这与各国的力量对比改变有关，和中国的关系就属于这类情况。但我也认为，我们不能因此就轻言放弃，进一步努力是唯一的出路。

另外，您刚刚讲到以前不太清楚英国内部还存在这样一个和解问题，其实我也很少有机会专门谈这个问题。今天算是第二次。在5月份一家叫日本军事史学会的组织请我做过类似的演讲。如果能够给各位提供一些参考，我也非常乐意，以后会再找机会谈这个问题。

主持人

请允许我提一个问题。95年6月众议院决议表决中，500多人里投赞成票的只有230人，也就是没达到半数。后来村山谈话发表，英国媒体进行了集中报道。在日本国内，至今也有人对村山谈话持否定态度，您在做相关工作的時候有没有感受到压力？

沼田

这些事件我都亲身经历过，所以我想自己有资格说几句。有人主张重新评价村山谈话，甚至主张重新评价关于慰安妇问题的河野谈话，对此我完全不赞成。这与我本人就是当事人有关，但更重要的原因是这些问题都是靠着一点一滴的努力才迎来解决的曙光的，好不容易搭起来一堆积木，又在中途一下弄塌，

这是我非常不愿意看到的。

另外，关于95年6月的国会决议，我也感觉在那一阶段是半途而废了。现在回过头来看，或许首相出自社会党这一点是很有深意的。但是，无论藤井大使还是我都在电视节目中多次表示“谈话是经内阁会议决定的，不是村山首相以个人身份进行的”。对这一谈话本身，当时国内很少有质疑的声音。我依然认为8月15日是一个很大的转折点，当时国内也意识到了日本政府明确表态的重要性。

主持人

您的意思是此后日本国内政治发生了很大变化？

沼田

发生变化的究竟是什么？秉承村山谈话精神这一点从来没有变过。自民党执政期间没有变，民主党执政后也一样。很难说到底什么发生了变化，硬要说的话，就是同中国与韩国的关系出现了很多难题，给国内政治造成了影响。领土问题出现以后，我们是没有把领土问题和历史问题挂钩的，但是两个问题却逐渐联系在了一起。国内对此也有反应。我本人认为在这类问题上表现出过强的民族主义倾向是不妥的。

主持人

我也很好奇外务省与政治家之间是怎样的一种力量对比。政治家变了，一切就都变了吗？我个人感觉外务省是最为保守的，实际情况如何呢？

沼田

我5年前就卸任了，没赶上现在这么困难混乱的局面，我原来的同事现在很辛苦。不知这算不算回答了您的问题？希望您能体会我的言外之意。（笑）

颜海念

我提一个简单的问题，95年村山首相第一次面对媒体公开道歉。我想各位也都知道，这是非常需要勇气的。在做出这一决定之前，是否征询了天皇的意见或者批准呢？我完全想象不出当时的情况，您能介绍一下吗？

沼田

我认为没有进行过这些。可能谈话结束后向天皇汇报过。

我想您的这个问题针对的是天皇作为象征的意义，以及天皇不参与政治的意义，不过我想从另一个角度回答。2009年7月天皇和皇后对加拿大进行为期两周的访问，我以官方发言人身份全程陪同，替天皇同加拿大媒体接触。我从当时的经历谈一点看法。首先，2009年4月举行了天皇成婚50周年新闻发布会，当时天皇说：“我一直在思考，现行宪法下，象征这一作用有着怎样的意义。”因为宪法当中只规定了天皇是日本国的象征，是日本国民整体的象征，以及天皇不具有参与国政的权力，除此之外只字未提。天皇一直在思考如何通过自身行为表现这些原则。

我想，天皇与皇后思考的结论是“为了国民的幸福与安宁牺牲奉献自己”。

正因此，他们亲赴震区探望受灾人员，在临时用作避难所的体育馆，他跪在地上与人交谈。他们认为这就是自己的职责。这与政治层面的事物是完全分开的，我想这正是当前日本的理想状况。

不过，我在访问加拿大时也做过解释，关于历史上的战争问题，政府与天皇是分开的，但对天皇来说，一年有四个很重要的日子。一个是6月23日，大家知道是什么日子吗？是冲绳战役结束日。据说在冲绳战役中冲绳县人民有四分之一到三分之一牺牲。再一个是8月6日，广岛原子弹爆炸。然后是8月9日，长崎原子弹爆炸。最后是8月15日。每到这四个日子里，天皇都心念死难者，重温实现世界和平的誓言。我想，天皇就是以这种方式参与此类问题的。

硬要想象一下的话，在即将发表村上谈话这样的时刻，如果政府找天皇商议，我想天皇会很为难的。

秋山

我出生于1941年。我接受的是战后的教育，始终亲身体会着日本战后的繁荣，过着和平的日子。日本与英国之间也发生过这么多的事，我真是有所不知。今天您的演讲内容十分精彩，不过现在有人主张重新认识战后昭和史。太平洋战争的历史，战后50年一直无人梳理，这一点是公认的。当然我不是说今天我们在这里回顾日本和英国的问题没有意义，但我认为不梳理这段历史会对今后的日本年轻人造成困扰。我们孩子的孩子今后要担起建设日本的重任。为此我们必须做好对昭和史的重新认识。战胜国与战败国存在着很大的差异。因此，我认为有必要对此予以重新认识。您的看法如何？

沼田

从这个意义上重新作一次思考的确是必要的。但是，尽管这么说或许有些轻率，我感觉从头来做，从战后总决算或战后清算开始这项工作，会偏向特定的方向。

粕谷一希、半藤一利等人关于战后历史有很多著述。读了这些人的文章，我也深有感触。在学生动员中被征召而在战场上丧生的人们是为了什么而牺牲的？是为了天皇而牺牲？还是为了建设一个新的日本？从这里开始梳理是理所应当的，将这些问题留给未来是不正常的。

令我感到有些担心的是，如果以全盘否定之前所做的一切为出发点的呼声太高，会使得我们和各个邻国的关系也非常难处。

主持人

与此同时，也有人在困难重重的情况下致力于中日韩通用历史教科书的编写工作。

沼田

我经常提到的北冈伸一老师就在做这项工作。尽管不容易，却很有必要。

陈景扬 我是来自台湾的留学生。钓鱼岛问题虽然与台湾有一定关系，但我感觉算不上重点。我的第一个问题是，您谈到英国在几百年间历经多次战争胜败，在这样的情况下，英国是否在几百年间反复向许多国家提出赔偿要求呢？

还有一个问题是，英国对日本的赔偿要求为什么是在上世纪 90 年代这样一个时间点上提出的呢？

沼田 几百年间如果处理战俘赔偿，这个问题需要追溯相当久远的历史，我也不是特别清楚，至于后一个问题，为什么上世纪 90 年代才要求赔偿，其背景是英国国内的情况。

一个就是刚刚提到的战争结束后归来的“被遗忘的军队”。从欧洲战场凯旋的官兵受到热烈欢迎，而他们得到的却是人们质问自己为什么在这个时候回来，对此他们心存怨恨。他们回国后在战后社会继续生存是很不容易的。他们找份工作，努力赚钱养家。我见过的那些人，如果战争结束时是 20 岁，当时就 70 岁了。他们不用再工作了，就回顾自己的过去，结果对这件事的怨恨怎么也无法抹去，希望国家能给个交代，这种情绪越来越强烈。

还有比较具体的一点，沦为战俘极力要求赔偿的人们大多是普通军人。这么说有歧视嫌疑，但这也反映出英国的阶级社会。军官们有的认为战争是特殊情况也就不追究了，但普通的士兵觉得他们什么好处都没有赶上赶上，留下的都是痛苦的记忆。这些复杂的因素互相交织，在上世纪 90 年代浮出了水面。

吴正根 我不是要提问，而是想谈一点自己的感想。我在韩国的报纸上读到这样一篇报道，说前不久伦敦奥运会闭幕当天，英国的退役军人及其家属约 20 人就发生在印度的日英战争举行了和解仪式。我不是很了解具体情况，但我认为英日两国迄今为止的和解进程是非常难能可贵的。正如沈老师所说，中日韩三国关系形势很严峻。我觉得各方历史观存在差异，问题就很难得到解决。所以我感觉，重要的是尽可能统一对历史的正确认识，将新的历史教给下一代，像英日两国迄今为止所做的那样，基于正确的历史认识来开展和解工作。

沼田 您所说的也是现在大家经常谈到的。我本人和秋山先生只相差两岁，但在学校里的确没学过这一时期的历史。我认为这是有问题的，可能造成孩子在成长的过程中对历史一无所知。这是我要提的第一点。

第二点是与美国的关系。同美国的外交工作我也做了很长时间，日本与英国之间有那么多问题，而同美国之间就没有，这令我深感好奇。原因在哪里呢？首先，英国的战俘人数更多。其次，日美关系一直以来还是在很多层面上要远比日英关系密切，从而给人一种正面印象，负面问题就不那么突出了。至于英国，像我刚才提到的，虽然在上世纪 80—90 年代随着与日本的经济联系极大加强，带来了正面印象，但一直以来未见解决的问题还是表面化了。

大家听说过《Unbroken》这本书吗？这本书篇幅很长，讲的是曾经参加过奥运会的一个美国长跑运动员加入了美国空军，被日军击落，辗转了好几个战俘收容所，最后被关押在位于现在和平岛的战俘收容所。这名飞行员在那里饱受折磨，战后也一直对日本怀有怨恨，直到有一天，他皈依了传教士比利·格雷厄姆（Billy Graham），此后通过宗教渐渐对过去的事情产生了宽恕之心，最终和解。因此，尽管日本和美国的关系中并非不存在这个问题，我今天还是以英国为话题，就是因为我在开头所说的，我在伦敦工作了四年，又在这四年里将几乎一半的精力用在处理这个问题上。

主持人

非常感谢。刚才演讲中提到的小菅信子教授曾经在 SGRA 做过演讲。据小菅教授说，她认识许多大使馆及外务省的工作人员，其中沼田先生是最了解和
支持 NPO 与市民活动工作的。接下来小菅教授想要做一次采访，我也恳请有关人员将此次采访的内容记录下来。（掌声）

沼田貞昭【ぬまた さだあき】 NUMATA Sadaaki

東京大学法学部卒業。オックスフォード大学修士（哲学・政治・経済）。
1966年外務省入省。
1994-1998年、在英国日本大使館特命全権公使。
1998-2000年外務報道官。2000-2002年パキスタン大使。
2005-2007年カナダ大使。
2007-2009年国際交流基金日米センター所長。
鹿島建設株式会社顧問。日本英語交流連盟会長

NUMATA Sadaaki

LL.B., University of Tokyo. M.A. (Philosophy, Politics and Economics), Oxford University.
Joined the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in 1966.
Minister Plenipotentiary, Embassy of Japan in the United Kingdom, 1994-1998.
Foreign Ministry Spokesman, 1998-2000.
Ambassador to Pakistan, 2000-2002. Ambassador to Canada, 2005-2007.
Executive Director, Center for Global Partnership, The Japan Foundation, 2007-2009.
Advisor, KAJIMA Corporation. Chairman, The English-Speaking Union of Japan.

沼田貞昭简介

毕业于东京大学法学部。后在牛津大学主修哲学、政治与经济学，获硕士学位。
1966年就职于外务省。
1994-1998年，任日本驻英国大使馆特命全权公使。
1998-2000年，任外务省新闻发言人。
2000-2002年，任日本驻巴基斯坦大使。
2005-2007年，任日本驻加拿大大使。
2007-2009年，任国际交流基金日美中心所长。
现任鹿岛建设株式会社顾问、日本英语交流联盟会长。

SGRAレポート No. 0066

「渥美奨学生の集い」講演録
日英戦後和解（1994-1998年）
（日本語・英語・中国語）

編集・発行 （公財）渥美国際交流財団関口グローバル研究会（SGRA）
〒112-0014 東京都文京区関口3-5-8
Tel: 03-3943-7612 Fax: 03-3943-1512
SGRA ホームページ: <http://www.aisf.or.jp/sgra/>
電子メール: sgra-office@aisf.or.jp

発行日 2013年10月20日
発行責任者 今西淳子
印刷 （株）平河工業社

©関口グローバル研究会 禁無断転載 本誌記事のお尋ねならびに引用の場合はご連絡ください。